

# 智媒时代新闻传播研究生人工智能素养的逻辑构成与提升路径

■ 冉华 唐欣怡

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正在深刻重构新闻传播的生态格局与知识体系。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素养不再是单一的技术应用技能,而是新闻传播研究生适配并引领数智行业变革的核心专业素养。学者何静通过“矛与盾”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工智能素养与人工智能媒介素养之间的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基于“正反合”三维框架,对新闻传播研究生的人工智能素养进行系统性解构与重构。“正题”指向人工智能素养,即研究生立足“传媒+”运用场景,对数字、数据、算法、算力等基本要素形成充分理解,掌握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应用驱动等人工智能思维方式,养成人工智能通用素养。“反题”聚焦于人工智能媒介素养,强调研究生穿透“算法黑箱”,识别数据资本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守护新闻真实底线,形成一种批判性与防御性的研判能力。“合题”则对应为智能新闻生产的批判性媒体素养。针对列夫·马诺维奇关于生成式AI“缺乏控制”的关键警示,研究生应着力强化对人工智能生成过程及其结果的批判性评估能力,保持清醒的建设性反思,进而精准锚定智能新闻生产在效率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点。

基于上述构成性理解,新闻传播研究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应具体化为四个维度的核心能力体系。首先,是人工智能内容生成能力。作为智媒时代的核心群体,研究生应着力提升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能力。它既包括具备运用数据挖掘、区块链、智能传感器等技术生成新闻信息的能力,也包括推动数智社会信息系统运行的基础支撑能力。其次,人机关系协调能力。智媒时代的新闻传播研究生应该自觉地把自己智能视为与人的感官系统高度耦合的“具身技术”,并对人工智能如何有效地改造人类的行动方式与知识结构进行深度辨析。同时,研究生还应当积极借助媒介物质

性的相关理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进行深入探讨,提升对AI大模型底层逻辑及运行机理的认知水平,学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智能体,并最终实现合作性创新、价值判断以及范式转换三位一体的能力升级。再次,是青年主体性建构能力。人工智能不仅驱动青年群体数智交往和虚拟社群传播,更从根本上重塑了“我是谁”的青年主体性问题。为此,新闻传播研究生需积极回应AI交往的时代议题,树立健康的数字社交观念,构建和谐有序的沉浸式虚拟社群,主动重塑青年主体性。尤其是在脑机接口等神经技术介入的背景下,研究生必须具备强大的数字身份(含数字分身)管理和“数字人格”塑造能力。最后,多模态跨媒介叙事能力。研究生需具备运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语音处理、语音合成等技术生成多模态跨媒介叙事内容的能力。同时,新闻传播研究生还要稳步提升数智媒体叙事准确性,在公共领域中坚守真实性与语境完整性。

新闻传播研究生人工智能素养培养,应基于新闻传播学成熟的理论体系 and 实践经验,建构正确合理的方法论认知,给予素养培养持续性的指导方向。一是要坚持“人智合一,伦理共生”的观念。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以及业界实践均证明,AI技术并不能代替新闻人的价值判断、同理心以及道德考量,人机关系是合作共赢而不是相互取代。唯有坚持人的主体性立场,以职业理性统御技术工具,方能防止算法趋同吞噬专业基因,使人智互促共生。其二,秉持“智能互联,产业重构”意识。人工智能全方位重塑新闻搜集、制作、传播及评估全流程,迫使媒体产业进行系统升级。人才培养应打通学界业界藩篱,立足于智媒发展新趋势,围绕诸如计算社会科学、智能内容管理、算法舆论干预、深度事实核查等热点话题进行学理探讨,并以此指导行业应用,推动传媒业转型升级。其三,“以自己为方法”的青年文

化研究。青年作为智媒时代的主要用户,同时也是网络及数字文化的重要主体。人工智能素养培养,应鼓励新闻传播研究生基于自身群体体验与媒介实践,从自身的媒介使用体验出发,将“自我”作为一种观察与分析的工具,深入探究智能时代青年群体的亚文化实践、情感结构与价值诉求,从而获得对当下社会的深刻洞察。其四,坚持“发现附近,服务地方”思维。在算法推荐的全球化浪潮中,警惕“附近的消失”。引导研究生利用智能技术重新连接社区,关注地方性知识与本土议题,用智能化的手段讲好地方故事,使新闻传播研究与实践扎根于具体的社会土壤之中,重建技术与人文、个体与社区的有机联系。同时,跳出虚拟空间的悬浮式研究,回归本土社会现实,关注基层传播、区域文化传播与地方舆论治理,将智能传播能力运用到地方社会发展实践中,彰显新闻传播学科的地域性与公共责任。

多维协同的提升路径与实施策略,需构建一个由知识结构转型、实践训练、文化研究与田野调查组成的四位一体提升路径。第一,立足知识转型,夯实“识—智”互转根基。新闻传播研究生需提升数智网络视听传播素养,增强多模态叙事建构与语境传递能力,全面提升人机协同能力。同时,需立足记忆型知识向智能生成知识转型大背景,不断增强“人智对话”创新实践能力,揭示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协同增效的内在机理。此外,青年研究生应强化智慧社会责任,推动完善智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参与推动覆盖全民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

第二,打造“做智媒体”项目制实践平台。依托高校融媒体中心或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设立聚焦媒体研发与创新的“智能媒体创新工场”。推动研究生组队承接真实的智媒体产品设计与运营项目,全面提升面向智能传播的人机协同计算思维。同时,以深

耕智媒实践为抓手,搭建校内实践平台与校外行业基地,鼓励研究生深度参与智能新闻生产、多模态内容创作、平台内容治理等实务工作,在真实场景中打磨人机协作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第三,强化内容甄别与事实核查的专项训练。以内容甄别与事实核查为底线,针对智能时代虚假信息、深度伪造等传播风险,开展常态化专业训练,提升研究生信息溯源、真伪核验、风险研判能力,始终坚守新闻真实性的核心准则,维护清朗网络传播空间。鉴于深度伪造与虚假信息的泛滥,应将“事实核查”作为一门必修的“硬核技能”进行高强度训练。同时,引入域内外先进的核查工具与方法论,组织“AI辟谣大赛”,培养研究生在面对可疑信息时,能够迅速调用技术工具、数据库资源与逻辑推理能力还原事实真相的职业素养。

第四,开展区域民族志与“附近”的田野调查。鼓励研究生走进贵州大地,深入“四大文化工程”实践现场,在此基础上立足特定的区域社会或社群,开展基于民族志方法的田野调查。例如,研究短视频、直播、虚拟数字人如何推动贵州“村字号”文化传播,或算法推荐如何影响民族互嵌社区的邻里关系。同时,利用智能穿戴设备、定位数据与社交媒体分析工具,记录与分析技术在具体社会场景中的采纳、挪用与驯化过程。这种沉浸式的行动研究,能够有效防止素养教育沦为脱离语境的技术崇拜,确保新闻传播人才始终保有深厚的社会关怀与现实洞察力。

〔作者冉华系贵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作者唐欣怡系贵州大学传媒学院学生。本文系基金项目:贵州省2024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数字赋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24YJJSJXGM020)的阶段性成果〕

# 媒介融合视域下思南花灯戏的数字化传播路径探析

■ 代盛兰 伍顺比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贵州省亦将“民族文化弘扬工程”纳入“四新”“四化”建设布局。在此背景下,非遗数字化传播已从“可选项”变为“必答题”。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思南花灯戏承载着黔东南地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贵州传统戏剧中民间小戏的典型代表。然而,面对创新不足、协同薄弱、受众有限、产业滞后等困境,如何借助媒介融合之势,构建适应时代特性的数字化传播路径,避免同质化和碎片化等传播风险,推动其从被看见走向被认同,已成为非遗活化传承与区域文化建设亟待破解的课题。

## 一、思南花灯戏数字化传播困境

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的崛起,为非遗传承拓展了全新空间。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12月)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7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4%。抖音平台2025年全年非非遗短视频播放量达8065亿次,平均每天7.9万场非遗直播。然而,在流量红利背后,思南花灯戏的数字化传播仍面临多重困境。

一是内容创新不足。平台上相关内容大多出自节庆演出中观众的即兴拍摄,画面粗糙且内容雷同,缺乏对历史渊源、声腔特征、经典剧目、传承人故事的深度挖掘。算法推荐虽能让非遗短视频迅速走红并获得流量,但同质化和泛娱乐化倾向也在弱化戏曲表演特有的现场感,使观众难以感受花灯戏“唱念做打”这一表演体系的艺术魅力,大众对它的认知被片面窄化为“扭扭唱唱的地方小调”,其作为多民族文化交融载体的独特价值难以彰显。二是协同机制薄弱。当前思南花灯戏的数字化传播呈现出碎片化格局,如传承人不懂新媒体、自媒体账号缺乏专业性、地方政府尚未出台系统性规划方案、高校研究成果与实际存在脱节,以及资金来源单一且难以支撑长期数字化项目。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机制尚未形成,导致传播资源无法整合,传播合力难以凝聚,其传播效果难以维持。三是受众圈层有限。思南花灯戏长期依靠线下演出和地方媒体报道进

行传播,受众圈层基本局限在本土范围,而短视频碎片化特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短板。如方言演唱缺乏字幕,完整剧情难以呈现,缺少情境铺垫的表演难以引发非戏迷观众兴趣。此外,戏曲审美所强调的在场性,在线上极难复现,看不懂和听不懂的文化折扣现象突出,在Z世代群体中的接受度尤其不高。四是产业融合滞后。思南花灯戏的数字化传播仍停留在起步阶段,覆盖采集、保护、存储、传播的系统化资源库尚未建立,大量珍贵资料仍未完成数字化转换。对比之下,独山县花灯戏已建成29个传习基地,并打造“非遗光影剧场”,单届花灯艺术节线上观看量突破500万人次,其数字化传播与产业融合模式较为成熟。而思南县虽从2022年起每年组织“传承非遗花灯”主题巡游,2025年国庆中秋期间还获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但些发展举措仍呈碎片化状态,未形成系统性产业转化机制,导致经济价值转化通道不畅且内生动力不足。

## 二、数字化传播赋能思南花灯戏的机遇

然而,困境之下亦蕴含机遇,媒介融合的深度发展正为思南花灯戏的数字化转型注入全新活力。传播渠道层面,短视频平台凭借跨地域、渗透性强等特性,正逐步打破传统媒体对非遗传播的地域限制。贵州作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非数字化提供了技术底座。抖音“非遗合伙人计划”和快手“手上的非遗”等公益项目,已助力不

少濒危非遗重获关注,并通过流量扶持与专业培训赋能传承人。思南花灯戏可借助此类政策契机,从深山乡土艺术走向更广阔的公共视野。受众群体层面,算法推荐能精准匹配潜在兴趣用户,有效消解圈层壁垒难题。相关资料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抖音“英歌舞”相关话题播放量超88.9亿次,衍生话题累计突破120亿次,其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189%。同期,福建省两大游神主题话题线上总围观量达2.5亿次,百度指数“游神”关键词搜索量同比上涨超300%。这些案例充分证明,独具文化内涵的地方非遗拥有出圈的受众基础与流量潜力,这也为思南花灯戏提供了可借鉴经验。传播形态层面,短视频平台已从单纯的内容展示窗口升级为集用户参与、情感互动和二次创作于一体的参与式文化空间。评论区交流、合拍挑战与直播实时互动等功能,正使受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这一变化有助于强化文化理解与认同,推动传播效果从被看见走向被喜欢与被认同逐级进阶。

## 三、思南花灯戏数字化传播的优化路径

数字化传播的本质,是借助技术手段对非遗的采集、生产、分发到消费环节进行再造。对思南花灯戏而言,这一转向既是其突破地域限制、盘活本土文化活力的内需,也呼应着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顶层设计。针对上述困境与机遇,可构建“文化传承—旅游赋能—产业升级”三维策略体系,以媒介融合为支撑,推进其数字化传播进程。

文化传承层面,关键在于从静态展示转向意义挖掘。即系统梳理花灯戏的剧目情节、经典剧目、表演技艺及传承人口述史,用长视频完整记录完整剧目,同时将核心唱段、身段、服饰等元素精细拆解,以适配快节奏的平台传播规律。叙事主线,应强化花灯戏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载体这一意涵,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素材。此外,常

态化直播可进一步拉近传承人与观众的距离,借助线上教唱、后台探访、互动问答等方式增强受众文化认同感。旅游赋能层面,重在以场景再造打通产融堵点。即把数字内容与思南当地旅游资源紧密对接,利用数字化技术还原传统演出场景,搭建沉浸式虚拟观演空间来吸引游客。同时在景区设置数字互动体验馆,让游客学习基本步法、试穿戏服、与虚拟传承人合影,并联合旅行社开发研学线路,将赏戏、学腔、访人串联成完整行程。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方言隔阂与内容碎片化所造成的文化折扣。产业升级层面,应以数字资源转化构建多元协同的良性循环。即引入AIGC对老唱片、老录像进行智能修复与再创作,开发数字藏品及实体文创衍生产品,再经直播带货串联起内容生产—流量变现—反哺传承闭环。同时,还需构建集政府、高校、媒体、传承人和市场于一体的协同机制,由政府将数字化传播纳入非遗保护规划并设立专项经费,平台为传统戏剧类非遗开辟专区并提供流量扶持,高校承担复合型人才培养和效果评估工作,传承人经系统培训后成长为稳定的核心内容生产者。由此,思南花灯戏的数字化传播方能从零散走向深入,真正实现从被看见到被认同的跨越。

数字化传播是思南花灯戏活化传承的必由之路,唯有正视创新不足、协同薄弱、受众有限、产融滞后等困境,从文化传承、旅游赋能、产业升级三维协同发力,方能推动其从被看见走向被认同。进而为贵州乃至全国同类型乡土民间小戏的数字化传播提供经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实践智慧。

〔作者代盛兰系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作者伍顺比系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本文系贵州省2025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媒介融合视域下思南花灯戏的数字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25YJJSKYJJ196)〕

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不仅强调总量的增长,更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动能的转换。当前,国有企业兼具市场化经营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双重属性,综合治理中存在层级管控冗余、激励机制适配性不足、产销风控数字化滞后等问题。为此,治理人员需立足高质量发展视角,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企业综合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 一、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国企综合治理的现状

(一)治理体系逐步完善。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多数国企已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框架,国有企业已明确党委、董事会、经理层权责边界,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治理框架。但综合治理中,多层级审批导致决策链条过长,终端市场响应效率偏低,影响着整体的治理成效。

(二)治理效能有所提升。随着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创新,战略落地、财务管控、风险防控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国企通过治理优化实现营收稳步增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持续提升。不仅能够降低国企经营风险,还能够在精细化管理中实现增收节支,形成上下协同、高效联动的工作格局。

(三)创新实践逐步推进。国企围绕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通过探索多项特色综合治理体系,积极引进数字化治理、“大监督”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创新举措,实行穿透式管理,初步搭建监督体系,但还未结合生产、销售、品控的行业特性形成专属治理模式。

## 二、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国企综合治理的创新途径

(一)优化治理结构,构建高效治理格局。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国企治理结构优化是适配现代化企业治理要求、释放治理效能的核心支撑。国企则需要重构“权责清晰、扁平高效、制衡到位”的治理结构,围绕治理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以此来构建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最终实现治理效能与发展质量的双向提升,为国企做强做优做大筑牢制度根基。

例如,国企需先将治理主体的权责进行清晰划分,梳理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事项清单、董事会决策事项清单、经理层经营管理事项清单,以可视化表格明确各主体履责边界、决策路径与制衡机制,杜绝权责交叉或真空,明确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职责,董事会负责战略决策、风险管控,让每一位治理者都更清晰地了解自身的治理职责。另外,还需要将国企的多层级管控调整为“集团—子企业—项目”三级扁平化架构,将每一部分治理领域实施针对性治理措施,推行“行业平台化运作+专业化管控”治理措施,搭建产品生产协同平台、品牌运营平台、相关方管理平台,从而实现治理效能和发展质量的双重提高。

(二)创新管理机制,激发企业内生活力。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国企管理机制创新是破解“活力不足、效率偏低、创新乏力”等问题的核心抓手。其不仅能够激励每位综合治理人员积极参与到治理活动中,还能够让治理人员持续创新治理的途径和方法,为国企发展筑牢根基。所以,需要结合国企人才、渠道、品牌特点,构建市场化管理体系,充分激发每位治理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此保障治理结构高效运转,进而增强国企治理的成效。

例如,国企需要调整治理人员的治理制度,建立产品技术骨干、营销人才、治理人才“能上能下”机制,面向行业公开招聘专家、高端营销人才,给予一定的自主权,激励更多人员参与综合治理。同时还应当对治理人员的薪酬进行合理分配,将薪酬和各种技艺、渠道业绩、治理创新等维度进行结合,向国家级专业技能人员、一线人员、核心团队倾斜,增强治理的成效。除此之外,国企还需要搭建“总部赋能+基层自主”的管理体系,总部聚焦行业战略、国有资产监管、品牌合规,基层子企业、项目团队聚焦产品生产、区域经销、终端服务,下放经营自主权,让每一层级人员都能够落实对应的管理制度,适应时代要求和发展需要,为高效国企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三)推进数字赋能,提升治理精细水平。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国企数字赋能是提升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的核心路径。不仅能够为治理提供便利,还能够实现智能化决策,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基于此,国企需围绕某些生产、经销、风控、品控全链条,搭建专属数字化治理平台,将业务、财务、风控等多维数据整合在一起,以便能够更精准识别综合治理的过程和成果,让数字技术能够渗透在各个环节中,进而为国企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例如,国企需要搭建贵州综合治理数字平台,有效整合产品生产、经销管理、财务资金、品控溯源、风险防控5大核心系统,并将每一部分核心治理内容进行划分,为数字化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另外,国企还需搭建多维度风险预警模型,覆盖产品安全、资金回款、经销商合规、产品溯源、廉洁风控,实现风险实时监测、智能识别、自动预警。并且还需要对现有的综合治理流程进行全过程梳理,将审批环节进行简化,压缩审批时间,将合同审批、生产费用报销、调拨审批等流程实现线上化综合治理,提升审批效率,增强智能管理成效。

总的来说,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国企综合治理的创新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国企应对市场竞争、破解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国企改革深化、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核心支撑。通过分析综合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合理的创新路径,能够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支撑。未来,国有企业还需结合当前时代发展的创新,以精准治理守护国有资产,赋能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综治保卫部(武装部)〕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国企综合治理的创新路径

■ 张魏君